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美」许倬云 著
程 农 张 鸣 译
邓正来 校



HAN AGRICULTURE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美〕许倬云 著
程 农 张 鸣 译
邓正来 校

HAN AGRICULTURE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 许
倬云著；程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3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 C. – A. D. 220)
ISBN 978-7-214-22608-2

I. ①汉… II. ①许… ②程… III. ①农业经济史—
研究—中国—汉代—英文 IV. ①F329.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593 号

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16 B. C.
– A. D. 220) by Cho-yun Hsu
Copyright © 2016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7-500

书 名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著 者	[美]许倬云
译 者	程 农 张 鸣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陆 扬 卞清波
装 帧 设 计	陈 婕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页 4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2608-2
定 价	4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王保顶

项目执行 卞清波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中文版序

《汉代农业》的英文本,原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所编的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第二次大战结束时,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研究部有不少第一流的学者,例如萧公权先生、施友安先生、李云桂先生、魏特夫(Karl Wittfogel)先生、Franz Michael 先生等中西大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汉代研究的丛书。可惜人事变迁,未能成功。最终只有瞿同祖先生的《汉代社会结构》及拙作《汉代农业》成书出版,而最终一位主持人 Jack Dull 已于昨年逝世,他自己撰写的《汉代地方政治制度》,至今还未出版。

《汉代农业》一书,原来是请在哈佛执教的杨联陞先生执笔。在 1969 年,因为健康问题,杨先生取消了原来的合约。华盛顿大学的计划主持人,遂找到我担起这一任务。当时我还在台湾工作,1970 年来美担任匹兹堡大学的客座教授,遂于匹兹堡着手撰写。我的专业兴趣是社会史,前此的研究工作,主要在社会变迁方面。虽然社会史与经济史是姊妹园地,到底仍有相当的差异。匹大历史系的发展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恰巧于 1970 年开始,系中同事组织了农民研究专题的讨论会,系中有七八位同事,有的谈社会史,有的谈经济史,有的谈发展理论,而每人又只是以一个地区或一种文化为研究范围。我们每两周即轮流在一位

同事的家中聚会一次,通常从下午7时,连续讨论至11时才散会。从1970到1974,四年来,在我不啻又经过了一次读学位的日子,汉代农业的布局和联想,得益于这四年讨论会之处甚多。《汉代农业》之外,另外有三位同仁也分别有专著问世。这四本书的主题、时代及所涉地域都各自不同,其受益于同人讨论,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今回忆,仍觉那一段岁月,紧张而密集的研究生活,十分可贵。1974年交出全稿,Jack Dull负责编辑,我们为了编排体例及若干观点的歧异,反复辩诘,动辄有长时间的长途电话。由成稿到出版,又花了四年,Jack Dull投注的心血不少!现在中文译本成书,特在此纪念这位故交。他才华横溢,可惜天不作美,未尽其才,可惜!

回到汉代农业这一课题,我的一些观点,已在书中交代,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之处,请读者指正!《汉代农业》强调中国发展了以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的经济。这一体制延续两千年之久,其关键性的转换点,则是汉武帝时代。战国至汉初,中国经济发展,在城市化和商品化两项动力的配合下,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工商业,《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富商大贾及《游侠列传》中的民间社区领袖,都不是一般农业社会所能出现。如果循此方向开展,中国的经济基础未尝不可能以城市生产业为主体,此后历史将可能完全不同。汉承秦制,皇帝制度与文官体系相结合,而汉代文官权力在统治控制中的比重,远超过秦制,遂有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情况。汉初官吏不是功臣集团成员,即是儒生或游士,都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士大夫集团,在城市中的力量不如游侠一类的闾里之雄。他们能与皇权共存两千年之久,也正因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入农村,而其转换点也在汉武帝时,转变的契机与经济转变相应而生。

本书特别注意汉武帝时代,尤其杨可告缗的影响,即由于从汉初重本轻末,景帝以来又致力打压闾里豪强,以至武帝时告缗令打击中产,商贾尤蒙受害。这一连串的发展,汉朝的皇权抑制了城市财富的力量,生产事业转入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小工业,同时农业获得非农生产的收

益,也使农村劳动力不致有季节性的劳逸不均。汉代政治力量的干预经济,竟有关键性的长期效应。

汉代政府对农业发展,除了“抑末”以外,扶助本业(农业)也有相当的效应。战国时代,列国争雄,东方诸国的工商业发达程度,不是秦国所能望其项背。秦人重农战,原是有其地理条件及历史背景,商鞅变法,更落实这一政策。汉承秦制,于劝农一事,也相当注意。赵过、尹都尉、氾胜之辈,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人员。郡国循吏,劝农与教化,都是重要的政绩。政治权力如此注意农业发展与农户福祉,堪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文化以外地区,殊不多见。美国的农业推广,是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努力,却是最近两百年的事了。

小农精耕细作,单位产量高,投入劳力及资本大,这种农业经济必须依仗非农生产及市场交换为其挹注。农产品经由市场网络集散交易,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然而以规模及深度言,世界别处,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前,罕有可与中国市场网络相比拟者。这一网络当然不是一蹴可成,必须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战国时代,中国已有不少大城市,大致都是其当地区域性交换网的中心。《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这些城市,并且明白地指出,这些城市是在区域间贸易的交通干道上的位置。一个涵盖当时中国的交通网络已经是经济的交换网络。经过西汉两百年的发展,从汉书的地理志等看,许多干线已向边缘分出为支线,线上分布不少新的据点。这一经济交换的网络将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合成较大的经济体系。

经由笼罩各地的交通网络,汉代中央政治下宣上达,各级行政单位(州、郡、县、道、都尉),其治所星罗棋布,无不坐落在干道与支线,或为网络上的地区中心,或为大小中继点。汉代察举人才,加入文官系统,其进阶也由乡村,经县级、郡级,最终可能参加中央政府。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精英,始终与家乡联系不断,分散在各处的同事及同乡,门生故吏,声气相通,经由信息传布的网络,这些精英编织了社会关系的网络,于是,有

形的交通路线,事实上也隐藏了无形的信息和社会的网络。

上述的网络结构,实与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市场交换有关。汉代有土地兼并的现象,但是大批土地的所有人,并不相当于大农庄的庄园经营,更不相当于大庄园的自给自足。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系列农业篇中,坚持汉代有大地主,于是认为汉代的农业不是小农经营。其实,中国的地主,自汉代以后,通常将土地分租佃户,佃户经营的仍是小块土地的小农庄,精耕细作的小农,不能自给自足,必须尽力生产农舍工业的产品,在市场谋利,以补充农业收入的不足。当然,边缘地区,人少地多,粗放的大农庄经营还是会存在,在外族进入中国时,征服者也可能占有大片土地,奴役种族奴隶,经营大型庄园(例如满清入侵后的皇庄旗地)。汉代的三河三辅等地区,大致均是人多地少,小农庄经营,势所必至;即使大地主,收取佃户租税,也比自己负责大批奴客耕作更为有利。不过,中国幅员广袤,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北方与南方,山区与平原……其各种差异必然也有相应的多样性农业经营,只是不论自耕或佃耕,小农经营应是最为普遍。本书以农业的市场趋向为重要的着眼点,认为汉代小农经营,不能不与农舍手工业配套。两千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常是一般人家日用消耗的主要来源。全国财富,经由这一集散网络,周流城乡,乡村常是经济的根本。在近代海通以后,一般日常生活品,不由舶来,即是城市中现代工厂生产,乡村失去了回流的财富,无此挹注,农村日益贫穷。许多有心人寻求各种方案,以拯救破产的农村。费孝通先生重建乡土的方案,则是在农村建立工业。最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终于证实了费先生的诊断可靠。台湾在经济起飞前,乡村及镇、市上的家庭生产事业,分包了零配件及一部分装配过程。那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也是与“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工作的小农经营阶段,相合不分。

由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工结合现象论,汉代农业发展的中国经济模式,也许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一些遗传基因。西欧经济,城乡分离,农

工分离,也有长久的历史背景,中国在海通以后,有一个世纪了,经济发展也卷入城乡分离和农工分离的漩涡,不得自拔。最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似乎又从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找到了自己的经济模式。将来的发展,中国不但应有农兼工,也应使农业成为工业化的新型生产。

本书校译者邓正来先生和程农、张鸣先生力疾译为中文,杨涛先生推介邓正来先生等担任逐译,十分可感,特此致谢。

许倬云

英文版编者前言

这本著作根本上是从政府与农民这两个角度来考察汉代农业的,农民角度的考察占了全书大部分的篇幅。按照经济史这个词的狭义,这本书不能算是经济史,因为现存的汉代史料过于残缺,无法对汉代历史进行经济史学者通常所进行的那种分析。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两汉四百年中任何一年谷物的典型价格或平均价格,更不用说各地的价格波动了。然而,关于那一时期的经济,这本著作又的确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对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长期的帝国大一统时期里农业的特质,我们可从书中学到的就更多了。 xvii

开篇这章介绍了战国晚期城市经济活动(商业化)和农业发展水平两方面的情况,为下面贯穿全书的比较提供了基础。战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经济发展的潜在能量,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的发展势头。向来有一种观点相信,官僚制帝国体系的兴起永远地窒息了这种潜在势头。这种看法的确有一些证据的支持,但这个问题高度复杂,不对汉代的整个经济作一番探讨,是无法充分阐述清楚的。不过,我们应当注意这一问题,因为它至少揭示了帝国政府在进行统治时的一个特别的关怀。了解战国时期农业发展的状况,对于理解汉代在农作方面所取得 xviii

的巨大进步是至关重要的。相对于汉代这第一个长期的皇朝时代所取得的进展而言,战国时期无论在作物种类上、技术上(如铁器的应用),还是在水利灌溉的发展上,至多都只是有一些苗头而已。即便汉以前的史料比汉代已经非常有限的史料还要贫乏得多,但现有的证据已足以显示,战国时期的农业水平要远比汉代简单和原始。

第一章介绍了汉帝国政府应对与农业有关的各类问题的种种努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对人口统计资料的一个观察,重点注意的是西汉时期,因为这段的资料相对较多。证据显示,当时的人口增长率高达1.6%,由此,西汉时期的人口总额应该翻了一番,或许还翻了两番。即使考虑到现有资料可能会导致一些偏差,我们也仍然可以推测,西汉时期的人口至少增长了一倍。人口压力在一些核心区域会很严重,这又会激发起对人口增长和集中现象的察觉与关注。早在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等就曾上书,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然而,朝廷却直到这些建议提出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较早的几个皇帝所采取的措施,实在比做做样子强不了多少,无非是告诫百姓发展生产、对农作出色的人予以褒奖等等。在汉初几代人的时间里,农民们离开乡村的原因可能还是城里较高收益的吸引。这时土地仍然是丰富的,虽然有人抱怨粮食储备不足,但农民会流入城市就表明谷价还不高。这也就是说,农民还不是因为土地被人兼并而被迫放弃农作。即便朝廷的确有组织百姓迁徙的行动,那也不单纯是为了发展生产,而至少同样也是为加强边防。因为农民们是被迁徙到北方和西北方的边疆地区,而不是迁往土地更加肥沃的南方。最终,政府为了对付人口增长的压力,开放了自己的园囿和保留地。这类土地的来源到西汉末年已基本枯竭,整个东汉时期,政府不得不满足于一些极为温和的救急性措施。两汉也曾有过重新分配土地的努力,其中以王莽的改革最为突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充分的改变,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自己的土地改革举措。实际上,政府等于承认了它无法与地主们正在崛起的势

力直接对抗。

第二章关心的是汉帝国政策里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政府在立法抑制工商业。这自汉高祖就开始了,到汉武帝时达到巅峰。此后,虽然歧视工商的大量立法在整个两汉时期都未取消,但无论是政府对官营垄断的保持,还是实际执行反商人的法令,都要么实施不力,要么根本没有实施。朝廷采取这些政策,只是为了遏制强大的经济势力,以免威胁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就国家在阻止人们投资于工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而言,它又在同样的程度上鼓励了对土地的追逐。历经若干代人的时间,朝廷实际在不知不觉地推动地主所有制的发展。国家在打击工商业上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功,最终都被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所抵消,因为对这些力量它最后已不能加以有效的控制。

第三章集中讨论农户。我们在本书里第一次将《四民月令》翻成了英文,它提供了对一个殷实人家多种多样的活动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将当时各种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看成一个连续谱,《四民月令》中的人家处于其富裕的一端,我们在这之后转而观察连续谱的另外一端,试图概括出一个普通农户的主要支出情况。由此得出的图景虽然缺乏细节,但已足以表明董仲舒、晁错等人在奏折中对农户困境的著名描述,至少对于西汉的前半段而言是过于夸张了,没有普遍的代表性。甚至对于整个西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这些描述都依然可能是夸张的。因为佃农的比例尽管在东汉两百余年里肯定是在持续上升,但在西汉时期还是相当低的。农民们无论是处于社会的高层,还是底层,往往都要从事市场买卖活动,除非发生了社会动荡,使他们没法再利用市场。这样,在国家力图压制工商业活动的这个社会里,农民的相当一块收入却只能从市场上获得。

西汉初年,土地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还是颇为富足的。迟至公元2年,西汉人均耕地面积还有2.27亩,而到了1400年,华北的人均耕地却

只有 1.72 亩了。^① 不过,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地主制度的缓慢发展,汉代农民们迫切地感到必须提高生产率。第四章讨论的是汉代的农作物,当时土壤的状况和农民如何改良土壤,以及政府和私人兴修水利的努力。这三种因素都在农作精细化的发展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xx

第五章考察了汉代农业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政府通过鼓励使用新的耕作方式和推广犁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农民个人的主动性也非常重要,无论在水田农作还是在旱地农作中都是如此。高质量的熟铁农具的发展也促使农作更有效率。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提高了。虽然由于西汉和东汉各自都长达两个世纪,我们只能作粗略的比较,但东汉的农民却比其西汉的先辈们要过得宽裕。

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汉代农民是卷到了一个市场网络里的。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第六章概略地考察了他们各种非农作的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在市场模式瓦解时,或当农民陷入了由水旱灾害所导致的严重困境时,他还有几种选择,但是其中没有一种是轻松的。他可以背井离乡,不是短暂地逃离灾区,就是永远地搬迁到帝国的另一个地方去。政府组织的移民与自愿移民明显不同。国家想要充实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的人口,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战略性的。但当汉代的百姓自己另择住处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向南方迁徙,那里土地富足,在汉代大部分时间里还在实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作。在市场体系落后的地区,农民会诉诸最后的手段,发动或者参与起义,试图以此改变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的社会-经济力量。屯田制原先是为了减少运往边疆的粮食数量,让兵士也当农民,自己生产粮食的一种边疆上的制度,但政府也会把它当做恢复秩序的办法之一。在政府正力图恢复秩序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时期,就像东汉初年和三国时期那样,这种农业与军事合一

① 这些数字是从帕金斯(Dwight Perkins)书中的表 B. 2 和 B. 5(页 220 与 225)的数据估算出来的,见帕氏《中国的农业发展 1368—1968》(芝加哥:奥定出版公司,1969)。

的体制便在内地也实行起来。屯田制下的人们由从事粮食生产逐渐扩展到恢复常规的市场活动,这种发展趋向本身就足以显示它的效力。

许倬云教授在后记里对这些主题又作了集中的阐述。他再次提醒我们注意汉代农民将其活动与市场力量整合在一起的程度。

我们将这一研究所依据的基本文献都译成了英文。关于这些文献,必须作两点说明。其一,尽管有些文献理解起来有困难,尽管译文有的段落会令论者不以为然,我们还是竭力减少了译文附带的语文学性的注释。这一领域的专家自己可以去参阅原文,我们觉得他是能判断出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翻译的。其二,我们并未试图去发掘这些文献所具有的全部价值。例如,文献里包括一些有关宗教和医学的材料,因为它们是从选出的材料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将它们也译了出来,但并不认为它们对我们的分析思路提供了支持。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的译文,相信这有助于减轻分析它们的难度,希望人们会觉得它们有用处。 xxi

在材料不足,没法依据它们顺理成章地得出判断的时候,我们也进行了推测。推测至少能迫使我们思考有关的问题,为找到各种可能的理解开辟出路。然而,凡是属于推测的译文,我们都适当地作了提醒。如果别人对这些段落有更确切的理解,我们会很高兴。

我在进行这本书的工作的时候,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果将他们一一列举的话,篇幅就会太长了。鉴于我已经分别向他们表示过感谢,在此我将只限于对一个人公开表示谢意,她就是玛吉瑞·兰恩(Margery Lang),她为本书的书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于书的最后编订尤其出了大力。福特基金会在这工作的早期阶段提供了资助,当时正急需资金来启动工作,我们对这一支持非常感谢。

杰克·L. 达尔(Jack L. Dull), 编辑

华盛顿大学

1979年9月